



我们真得信任专家吗？

随着信息渠道的快速发展，专家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奈梅特·沙菲克

“为何没人注意到这一点？”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询问该校的教师。

约十年后，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不可预知事件的发生，大家也这样询问专家。公众对经济学家、民意调查者和专家的信心已经动摇。

不仅专家受到质疑，就连他们在观点上的垄断地位也被技术所削弱。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公众能够在专家发表意见之前就获得大量信息，同时根据个人的喜好和兴趣推送针对性的新闻，并使人们越来越独立地选择自己想关注和信任的人。

专家为我们做了什么？

回顾巨蟒剧团的作品《万世魔星》（又名《布莱恩的一生》），该剧讲的是一个名为“犹太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 of Judea）”的团队组织了一次推翻罗马帝国的反抗行动。在他们的领袖雷哲（Reg）大喊“罗马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之后，反抗者群情激昂，情绪达到高潮。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一位普通百姓小心翼翼地指出当地的水渠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后，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细数罗马人带来的其他的有用的创造，直到最后雷哲不得不重新说明自己的问题：“除了卫生、医药、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马路、淡水系统和公共健康之外，罗马人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都需要专家。他们帮助我们应对疾病、减少贫困并改善人们的福祉。随着水资源变得更洁净，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变得更先进，人们的寿命比1950年时延长了约20年。随着经济政策的完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完善，世界平均收入提高了至少20倍。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我们需要可靠的、受大众信任的专家。

但如今的专家已失去了以往的垄断地位。技术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改变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并影响人们形成观点的方式。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有半数以上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在美国，这个比例比2013年之前增长了一倍。

要想实现知识的数字化并随时获得知识，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普及知识并下放权力。人们可以找熟悉有关疾病及其他替代疗法的医生看病。群众可以提供对餐厅的评论，评估产品和服务，并提供针对一系列问题的新思路。数以千计的个人提供的“喜欢”与“不喜欢”以及评论可以建立信任。

但是，这样做也存在弊端：难以核实的信息会让人无所适从；不同的算法会在志趣相同、但从不转换视角的人士之间引起共鸣；虚假的新闻会扭曲事实；匿名的做法会赋予使那些可能会滥用职权的人获得权力；秉持点击率越高、收入越高这个观点会让发声最大者得到奖励，并宣传偏激的观点。

筛选信息并基于信息提供判断的专家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而且他们的语言难以被人理解，这常常使他们的声音很少得到关注。专家通常通过所获得的证书、行话的使用、对学术期刊的控制，以及影响对新专家的培训来使自己区别于非专家人士。这些界限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存在许多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雇员在最新发布的一篇博文中分析了该行各种刊物所用语言的复杂性，发现在五个人中只有一个能理解这类语言。

信任格局的不断变化同样也让专家陷于不利境地。2017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发现，在近2/3的国家中，不到50%的人口相信主流企业、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做正确的事情。现在，人们信任的是其他人。“像我这样的人”的可信度与学术或技术专家相当，并远高于首席执行官或政府——认为家人和朋友更值得信任，这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明显。

重塑信任

牛津大学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高可信度：通过对标准的立法、监管或指导——通常辅以确认合规的要求——或者通过让大家自己评估可信度的信息。但是，我们该如何重塑专家的可信度呢？

要简短，不能虚张声势：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曾说：“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在于，傻瓜和狂热分子总是对自己信心满满，而富有智慧的人却满怀疑问。”专家们一来不知道他们的模型是否得到正确使用，二来不确定他们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型。从长期来看，坦诚自己的不确定能建立专家的可信度。对此，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英格兰银行采用扇形图进行预测。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央行也采用了这种做法：针对既定的初始情境，扇形图显示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预测一个结果。但是，传递不确定性会让信息更为复杂，而且无法在一个要求简洁的世界中获得大众的欢迎。例如，与其推送“如果与当前相似的经济形势得以延续，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最佳集体判断是，对GDP增速的成熟预测为：GDP增速有50%的可能性会超过2%，另有50%的可能性会低于2%”，还不如推送“英格兰银行预测增速将达到2%”，这样会容易得多——也更为有效，尽管前者能更准确地描述扇形图的真正意思。

简言之，专家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简短地进行交流，但不能虚张声势。

媒体的最佳实践：鉴于媒体在干涉民主国家中专家的观点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标准和好实践也至关重要。尽管这些标准和实践的确存在于多数的传统平面和广播媒体之中，但是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行业的经济状况，催生了一批新的博主和伪新闻记者，他们有时并不遵守公平、准确和透明的标准。此外，在新闻发布方面，社交媒体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使消费者越来越难以区分合法新闻与其虚假变体。所有这些都解释为何2016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的研究会发现，有超过80%的國家的主流媒体已经失去了大众的信任。

假新闻的增多以及所谓的假均等——即在平等报告的名义之下，对可信和不太可信的信息源分配均等的时间——只是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呈现相对立的观点方面，信息发行者和专家如何才能保持均衡的可靠性？

可以通过调整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标准和原则，扩大应用范围至全球智库、网站和媒体。同行评审、研究资金的竞争、发行数据的义务，以

及出版业利益冲突的透明度等业已成熟的原则管理着智力贡献这一重要方面。例如，智库应该公开报告自己的融资来源吗？如果记者和博主报告或传播虚假信息或谣言，是否应该被曝光？数字化平台是否应该为履行传播义务和保护自己的品牌，而为其所发布的内容担负更大的责任？

采用公共工具评估可信度：民众必须在信息爆炸时代区分事实和谣言。在线电子商务已开发出各种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消费者的评估、其他评估者的可靠性反馈以及按时交货等绩效衡量标准。

在创意辈出的世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一些领域，传统机构已经能够满足这个需求。权威医疗网站为具有分辨力的病患提供可靠的信息，否则这些病患将不得不筛选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事实审核网站通过审核公众人物的说法，模仿学术界的同行评审，从而建立或质疑新闻和个人声明的可信度。国际事实审核网络的原则规范主要针对无党派人士、融资来源的透明度、方法论和基于事实的纠正情况。

专家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简短地进行交流，但不能虚张声势。

新机构正试图提高已被侵蚀的可信度。例如，在英国，致力于提倡银行业执行标准的英国议会银行标准委员会和为金融批发业务市场制定标准的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标准委员会，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不当行为丑闻爆发之后成立。高校必须教育学生成为具有分辨力的知识消费者，而公众意识活动能够改善媒体。在到处充斥着信息的世界，教育的未来将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判断能力，让他们成长为见多识广的公民。

技术官僚统治和民主制之间的界限：随着决策变得日益技术化，未经选举的专家正日益进入经选举产生官员的权限范围之内，此举给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当专家试图成为政治家时，问题就会出现，反之亦然。明确可以提升他们自己

的角色和责任至关重要。如果专家越界，就会破坏对其技能和专业责任的信任。而政治家一旦越界，就可能面临误导其支持者的风险，后者希望其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民事服务机构、央行和高校等独立机构在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介入技术专长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是技术官僚统治必须从民主制中获得权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技术输入，这就要求专家负起责任。一些批评家认为，财务审核、研究质量控制、流程和合规审核、环境影响评估、独立评价办公室、议会询问等活动代价高昂，鼓励大家规避风险，并分流重要工作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专家为民主决策提供建议的合法化，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很小的。

基于知识的未来

通过媒体和机构提供教育并进行传播，从而实现知识的应用和积累是实现人类进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不通过专家来管理，而是如何确保专家的可信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真诚而谦卑地承认技能短板、清晰的沟通、严格评估信息、利用工具帮助公众区分不同的想法，并认真聆听他人的意见。

改善对专家和政治家的权限和责任的管理，将有助于维持技术官僚统治和民主制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能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未来将由知识和基于信息的辩论所决定，而不是无知和狭隘。^[FD]

奈梅特·沙菲克（NEMAT SHAFIK）即将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一职。